

凝望那渐行渐远的背影

■赵柏田



《西皮散板》，方向明著，宁波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28.00元

南宋时，上林湖畔有个叫高翥的，是江湖诗派里“较有才情”（钱锺书语）的诗人，一生游荡江湖，诗酒销磨，临老了，在湖边搭了一间草屋，号“信天巢”，自称，这个屋子虽然小仅容身，却有数不清的书籍供他“障俗尘”。在方向明先生新近出版的散文集《西皮散板》中，时时出没了这个南宋诗人的身影（在某行政中心的历代名人浮雕里，此人又令人啼笑皆非地被误作“高者羽”）。上林高翥，这个一千多年前诗情飞扬的名字，在方向明眼里就是一盏俗世生活空上的灯——生活必须被文学照亮。高翥的放弃与

坚守，乃是他今世生活的一个样板。当方向明在他的“半亩方塘”里读诗、读帖、读画，营构着他的艺术人生，想必也有这种“不与世争闲气，且随时养老精神”的闲适自如吧。

爱书人方向明如是描绘他兼作书房的客厅：图书二壁，中有半窗一几；除此之外，床头柜是书，食品柜是书，电视机旁是书，女儿的钢琴也成了书架。每次出门，行囊中必塞满书。各地大小书店，更是时常逛荡，成了他的书库兼阅览室，某年在台北街头的诚品书店，竟逛至凌晨两点，才拎着三袋书回到酒店。

他读鲁迅，沈从文，读老舍，也读王阳明和李泽厚。当代作家里似乎更喜欢以先锋起家的莫言、苏童等。这种阅读方向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青年的那种趣味。然后，“很多的阅读与少量的写作”成了他的一种方式，而嗜书若是，也正是为了印证知堂所说：“在短的一生里享受长的精神上的快乐”。

这个书虫的形象，仅是方向明诸般人生姿态中的一个侧面。我与方向明相交垂十年，他是我学长，后来又成了同行。每次他来宁波，或者我去慈溪，说得最多的却不是书事——或许在方向明看来，访书、求书，止是二三素心人可以相谈的雅事——而是他兴冲冲地做着的那些事：以名画家陈之佛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艺术馆开馆；辑录出版七个近代乡贤诗人

的吟稿“溪上诗丛”。有时他还会以极大的褒扬的语气，说起当地一个作者的外地长篇小说（这些诗人、作家后来都出了书获了奖，向明兄不只为他们出书，自己还操刀写评论）。有一次他突然欣喜地跟我说，发现了本地一位曾以养蜂为生的老诗人，1945年生人，二十多年里跟着他的蜜蜂们逐花而居，写下了好几本诗，“太阳在这里放牧，你听，多好的诗啊！”

凡此种种，我看到的是向明兄与生俱来的热诚和那种对文化的尊崇之心。从文之前，向明兄做过慈北镇名镇鸣鹤镇的镇长，此镇有白湖，清中叶就有土人结社于此，民国十九年，弘一法师在湖边金仙寺驻锡，在此地收一俗家弟子胡宅梵，赐法名“胜月”，十余年间师弟师弟雁雁。对乡贤的追慕竟使向明兄做出了一桩令我十分感佩的事，他点校出版了胡宅梵的诗集《胜月吟稿》。这几年慈溪经济名声在外，名家大刊纷至沓来者，一如过江之鲫，举凡把慈溪设为《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颁奖基地等等事件背后，都有着向明兄奔忙的身影。

话回到这本《西皮散板》上，作者自谓，西皮散板是一种无板无眼的唱腔，然在我看来，正由于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文之心，这本集子里的文字也都可爱。可爱不但大弦嘈嘈，小弦切切，都有着一个个向心，说的都是人在文化空气中浸润的种种情致：

——比如他以西湖为情人，到了西湖必去看李叔同和苏东坡。

——比如他去看福建土楼，看到的是从形态上固化了的以族权为核心的礼法制度。

——比如他到了白马湖，看着那一泓秋水，就想到那个年代里的朱自清夏尊，直觉得湖边的一棵樟树，甚至树上的一根枝桠，都可以安顿他的身与心，以至说出这般的民国风的话来：“湖面上的风轻轻地拂过我的脸，我像一个孩子一样睡去。我也要做梦，梦里也有风。我甚至愿意就这样一直躺着，在白马湖的一棵大樟树上睡去”。

而最令我动容的，则是他与弘一法师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把向明兄身上的那种文艺范演绎到了极致。那是在厦门南普陀寺，一次关于生命与美的寻访：

你先是和煦的目光看着我。你瘦了，身板倒很结实，走起路来僧衣飘动，生出风来。你肩背背着一把伞，老式的油纸雨伞，我知道那是你母亲留给你的遗物。你没有说话，好像又说了很多。你用目光与我交流。你的目光里，有沉静，有忧伤，还有悲悯。（《我来看看你，弘一法师》）

乱云飞渡的年代里，牵引他目光的，还是白洋湖畔那长衫的那几个背影和他们长短不一的吟哦。对陈之佛、邵老羊这些慈溪籍艺术家以及董春、洪允祥、柴小梵等“溪上七子”的书写，笔底更是常带感情。这些渐行渐远的背影和着那个年代，让他出神地长久

凝望。而《西皮散板》中的许多文字，未始不可作为这种凝望的姿态来解读。在《以佛的修为做人立业的事业》中，向明兄引用了陈之佛1946年在国立艺专校长任上的一篇演讲稿，其中数语也可读作他对这个浮躁年代的批评：

“……如果都迷惑于物质的享受，迷惑于浅狭的功利主义，天天被困于名缰利锁而不能自拔，美的情操复杂，趣味卑劣，生活枯燥，心灵无所寄托，那我们虽称为人，已在已失去了人性。”

人性之美正是这本散文集的又一引人入胜处。向明兄一向是个把生活安排得很妥贴的人，这种细心周致正见于他写老家屋后那条路，写家人聚餐，写父亲、伯父们、母亲、岳父、舅婆、妻子、女儿以及儿时的村里人的种种笔端，俗世里交集着的种种悲欣，也正在寻常的烟火里。一次由于母亲的反对而夭折了的旅行，在一个成长中的少年心里激起的，是一次16公里的逃离。多年以后，昔日的少年已为人父，他终于醒悟到，每一个儿子都活在母亲的怀中，他注定逃不了由这份爱衍生的幸福、安慰、疼痛、苦恼、叛逆和责任：

“有那么些年，我自以为是冲出16公里以外冲出了母亲的包围，其实我永远走不出母亲的目光。”

有此凝望，有此牵念，才是真人生。而得一真字，文字才有魂，散亦不散了。《西皮散板》，正可作如是观。



丁元公绘水浒人物图

关于《丁元公工笔彩绘水浒人物图》

■洪再新

呜呼！论画之难，难于识见。曩读弥勒居士《国朝画征录》，开卷记了元公者，与陈洪绶前后论列，颇不解其措意。元公字原躬，嘉兴布衣，后人空门。弥伽与之同籍，闻见既近，深慨其胸怀有不可一世者，且引本乡先贤竹老人语，赏其四绝，称为逸品。及其与老莲之画缘，若设计一伏笔耳。

余治画史，雅嗜老莲，其留存寰宇之名迹，寓目泰半；尤尚徽州诸黄鹄刻之《水浒传》叶，因《五才子书》癖也。而元公艺迹，星散零落，竟无一觐！辛卯初夏，讲学南山，课暇携弟子谒吾师黄时鉴先生于苦竹斋，谈艺问道。临别言及拜访老莲莲暨故里，先生遂出一册页，题曰“丁元公工笔水彩画水浒传人名精品”，又末叶钤“净伊”朱文印，乃元公释名。余大喜，不意于苦竹斋得见元公摹老莲真迹，泪翰墨胜缘也。展册摩挲，不忍释手。是册缕裱对叶十八幅经折装，三十六天罡，跃然纸上，势若扑面，真凛然有生气者。单叶画心宽十四公分，高廿一点二公分，无笥记，题费用欧体正楷，错落自如，章法一新，匠心独运。或叹老莲之《水浒传》，明清诸刻各有破绽，脱落；余谓今得是册，不啻一睹老莲真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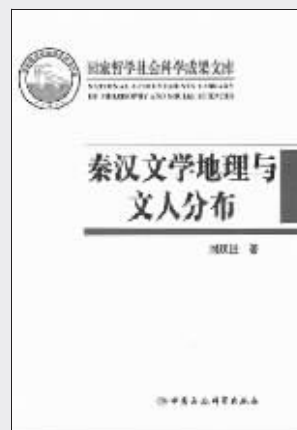
老莲早年白描本四十叶尚存，老造像、题记与刻本大异，以物用不同之故，今人考据甚详。后绘水浒四十人物图，奇形怪状，风格再变，惜乎存佚不明，益见元公所本，乃非寻常之作，或似《陶庵梦忆》记周氏所巧老莲之《水浒传》绘卷。元公精篆隶，运笔刚健，以高古游丝、铁线、折芦、琴弦描法，作须发、躯干、衣裳、铠胄，各臻其妙，诸黄所刻《水浒传》，实难与俦。是册又于人物服饰，施色典雅，气息纯净，类老莲之敷彩，古趣盎然，且乎直追晋唐。噫！活老莲绘笔者，非元公谁克当之？

甲申之变，老莲、元公同居绍兴，《画征录》不书；而所谓“知原躬者祇原躬，原躬隐矣”，则信然。观净伊所写水浒英雄，方悟弥伽居士之慧识。惟净伊此册，藏宝至深，世所不闻。今苦竹斋主揭发宝藏，刊布家珍，由中西书局宣纸仿真影印，公诸天下，题曰《丁元公工笔彩绘水浒人物图》，为治画史、白话文学、社会民俗、视觉文化者，圆一功德，真乃艺林幸事也。

（《丁元公工笔彩绘水浒人物图》，中西书局2012年8月第一版，680.00元）

先还原一片森林，再细看一棵棵树木——刘跃进的文学地理研究

■徐华



《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刘跃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76.00元

任何文学活动的发生，必然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系统中。一切文学研究，也必然同时遵循历史的线索和地理的线索。两者融通所构成的立体文学场域，方为文学的实际生态。近年来文学地理研究的兴起，正说明长期以来学界多注重纵向单向研究，忽视横向立体研究的缺失，得到了重新修正。刘跃进先生新著《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立足于秦汉时代，追溯当下实际的地理布局，以人系郡国，以郡国合区域，以区域呼应统一国家，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可谓在断代文学地理研究中开辟了一处生机勃勃的空间。

研究断代文学地理，不可或缺的是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跃进先生《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是在其《秦汉文学编年史》、《先秦两汉文学史科学》、《秦

汉文学论丛》等著作基础上的又一新探索。整体的思路非常明显，就是在断代文学史的研究中，首先掌握所能搜集到的直接史料，其次，按照时间的线索整理材料，梳理历时性的文学发展脉络；再其次，依托地理铺展，还原空间意义上的文学活动，包括与政治、经济、学术的关联，以从立体多维的视角，重新审视当时的文学气候，文学活动的发生。从作者下一步的研究路向看，则为回归经典文本，进行系统的作品研读。由此，本书所在的系列成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在治学途径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禅宗有言，参禅之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悟道之后，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文学活动作为文学活动最直接的结果，譬如山水，主要看今人审视的目光，是就作品论作品，还是在还原时空语境的基础上，以创作发生时的种种关系，与作品的解读相互印证。后者，无疑已经是在一个更全视野上的重新审视，意义自然不同。

是先还原一片森林的原生态，再细看一棵棵树木的工作。《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分上、下两编。上编由“三辅地区文学”、“三楚地区文学”、“鲁学与鲁地文化”、“齐学与齐人创作”、“河西走廊文学”、“江南地区文学”、“巴蜀地区文学”、“黄河以北地区文学”和“中原文学”八章构成，分别勾画了秦汉时期上下四百年间分区域的文学场域，并彼此呼应，联为整体，构成宏观的时代文学场域。下编内容为“秦汉文人分布”，以103个郡国为单位，再分别展现各郡国内

作家的分布情况。

从该书的分区方式看，本书与以往侧重于今人习惯的分区方式或者后世的当代行政区划来分区不同，作者采取尊重古昔，回溯历史的态度。结合《史记·食货志》《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的地理分布情况，加之人口分布的调查，当时方言分布的调查，力求采取最切合实际的区域划分。在对“秦汉文学地理”的分区中，没有采取后人普遍认可的几大文化圈的划分，而是结合秦汉地理区划的实际情况，进行事实性的分区。如后世一般均以“齐鲁”为一文化圈，本书则分别探讨“鲁”与“齐”的文化特质与文学升降。再如对于楚地文学的探讨，并没有以“荆楚”统而概之，而是依据楚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史记》中三楚的划分，分别按东楚、西楚、南楚来探讨楚地文化和文学的复杂性。除此而外，值得注意的是，河西走廊作为汉代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建制，其文学生态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

对于秦汉“文学”与“文人”范畴的确定，也体现了作者敞开心式的通达文学史观，于过去突破了狭隘的文学和文人界定形成了突破。《秦汉文学编年史》一书中共计440年的完整编年，涉及的文人达500位，作品达800篇。至《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依据史传有籍贯记载的文人共计622位进行了系地，此一夫时代当中的作家作品几乎囊括殆尽。就秦汉断代文学来说，这种广泛的视野大大突破了纯文学视角下简单的文学史映像，也为宏观文学场域的展现提供了丰富的可依据的内容。本书的作者依据现存史籍中所有所能搜罗到

的有主名的著作、作家，以《汉书·艺文志》、《后汉书·艺文志》（补）、《隋书·经籍志》等几部文献为中心，汇聚所有有作品的作者。正如东汉王充《论衡》中才将儒分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类，虽然分出了文人一类，但其所分仍在学术的范围内划分的。范哗《后汉书·文苑传》虽将文人独立立传，但已是后世所为。因此，本书所采取的通达态度，正与其时的实际状况相吻合。

探讨地域“文学”的特质，还需将其放置到其所在的特定时代语境和地理参照当中，并建立与社会生活之普遍联系。一地域文化风气之形成非一朝一夕，且与膏壤山林之助，政治生活之取向、经济繁荣程度、风俗盛衰都有密切的关联。本书中“秦汉文学地理”的观照，便充分体现了跃进先生所倡导的“研究文学，必须跳出纯文学的范围”的主张，将探究的目光投向了广阔的时代景象以及其中的精神变迁。由此，我们看到文学现象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普遍联系中，具有当下特定的语境、情境和心境。因此本书上编八章中所呈现的秦汉时代八大重要文学地域，并不是停留在平面的地图分布，而是通过各种因素累积下的地域场景还原，实现了立体性的语境重塑。如对三辅文学地理的还原，在探究三辅地域文风底色的基础上，关涉到统一王朝下移民政策的实施以及对于地方文学品格的影响。三楚文学地理，在探究楚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又分别指出随着楚国政治中心的位移，楚文化与齐鲁文化、越文化相互影响模式下所形成的微妙变异，以及这种变异在文学进

作家荐书



天望和天问

■肖复兴

伯对男主人公所说的话：“我的故事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才能够读明白。”这是一个标尺不低的要求。

荷兰华人作家林滢倾注十年心血的这部长篇小说《天望》（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尽管有着诸如男女主人公的一见钟情、女主人公的萍水相逢一夜情以及意外生子、男主人公如《简爱》里的罗切斯特的双目失明以及最后爱融化一切的大团圆，这些传统小说情节构造的基本要素；同时，涉及到漂泊、还乡、生死、性爱、文化的差异与碰撞等现代小说叙事表达的基本元素；但是，这部小说走的既不是传统也不是现代小说的路子，它既没有现代小说的玄虚、跳跃与幽深，也摒弃了传统小说对故事注重与铺排的依赖，甚至对于细节也大致可以忽略不计。在时空线性发展的小说中，情节与故事，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框架；细节描写，则让位于水一样蔓延于小说无处不在的心理与思辨。

作家更关注的，不是故事多么的曲折与好看，不是细节多么的丰富和生动，而是处于纷繁变化且矛盾千疮百孔的现实世界中人物的生存状态，特别是精神状态：堕落与再生、污染与净化、徘徊与奋争。特别是，小说加入了大量关于宗教、哲学和艺术的计量，以此扩充人物的心理与思想的容量，增强小说的分量，便使得小说的叙述结构呈现出多重性，而不囿于传统和现代两翼。如果把小说比喻为容器，传统小说如古色古香的陶罐，现代小说似造型奇异的水晶杯，这部小说则希望自己为地上的一泓广阔而深邃一些的湖，吸纳天上云光碰撞而化成的水露，荡漾一些天光浩荡。

不少人认为《天望》是一部新移民小说。其实，它不是，或者说不是纯粹的新移民小说。尽管小说中有不少从中国到海外形形色色且命运各异的漂泊者，除女主人公微云，都是走马灯一样即来即去。这部小说

的主人公不是新移民，而是正宗的洋人弗来得，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小说所有的人物与故事，都是围绕着他来展开；所有的情感与思想，都是以他为中心而喷发；读者所有的感动和感喟，都是源于他而得来。

非常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出现的所有华人即新移民人物，没有一个能够如弗来得对宗教对人生对爱情那样的真诚与奉献，即便女主人公微云最后也将母亲给予她的玉石妈祖海神丢弃了。弗来得从小说中一出现到最后的结局，其性格未有丝毫的改变，始终如此善善美美，显然是作家有意为之。这样的人物的塑造，不仅与新移民小说迥异，就是和如今其他小说门类也完全不同。

尽管真诚而执着的弗来得，遭受生离死别以及种种磨难而始终如一，不过，他不是传统小说中的堂吉珂德，也不是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他面对的并不是中世纪的外部世界或仅仅是磨难的轮回，而是现代

人内心的焦灼与精神的困惑。弗来得，更像是约伯，以一个圣徒的形象，企图以他信奉的天国来拯救人间。小说所面对的一切，始终是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心灵与精神，在天国、人间、地狱三界，在神性、人性、兽性这三性中彷徨与斗争。因此，这部小说的精神性大于文学性，人物的符号化大于形象性，故事所追寻意义的寓言性，远远超过一般的新移民小说。从这一点意义而言，《天望》可以说是对新移民小说创作疆域的一种拓展，创作实践的一种新的探索。

读《天望》，让我忍不住想起我国古代的天问。天望和天问，一望一问，差别在哪里？一仰视，一垂首；一对上苍的敬畏与信仰，一对下界的关注和痛心。前者更多是来自宗教的自我救赎，后者更多是来自对人对世之谜的破解。前者更多是属于精神的，后者更多是属于现实的。说俗一点，一个希望灵魂升天，

一个希望根扎在地。一个属于灵，一个属于肉。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写弗来得的教友海伦，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子，对弗来得怀有感情，弗来得对她也有好感，当她决定要去非洲，来和弗来得告别，“弗来得很想用手按住它的肩膀上，突然又改变了主意，他怕这种举动会惊动她的思路”，海伦转头正看见他的手势，情不自禁的抱住他，他被感动而紧紧地拥抱了海伦，对海伦说：“走你的路吧，你已经回到了羊群，牧羊人会看顾你的，凡在栅栏外的遭遇，将会成为你生命宝贵的财富。”最后分别时，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海伦说，‘别忘了写信给我。’”

尽管这部小说中不少关于宗教、哲学和艺术的议论很精彩，对当下也很有针对性，但是，毕竟理念性过强，对文本的小小说性会有所损害。这样的描写，生动细腻且有层次，依然是重要的，是小说的动人之处。